

# 论新闻报道中的不可靠叙述

冯月季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受到了叙述学各种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并且产生了多方的理论分歧与学派争端。但实际问题是:不可靠叙述是否只存在于虚构性叙述中?在我们通常认为的事实性叙述中是否存在不可靠叙述的可能?以一些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新闻报道中不可靠叙述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路径,可从传统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转换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可分为文本内不可靠、伴随本文不可靠、历史文化语境不可靠几种类型,每一类型背后都隐含有相应的文化机制。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新闻报道 研究路径 分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2)07-0078-03

自韦恩·布斯于1961年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不可靠叙述以来,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探索基本上锚定在虚构性叙述当中,而在事实性叙述当中是否存在不可靠叙述,一直是叙述学家们论及甚少的话题。基于此,本文在综合前人对此概念的研究之后,试图分析事实性叙述当中的不可靠叙述问题,以生活世界中最常见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阐释新闻报道中不可靠叙述存在的可能性、研究路径、分类,并简要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机制。

## 一、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何以可能

多数学者认为在新闻报道等事实性叙述当中不存在不可靠叙述的问题,其理由是:在新闻报道中作者与叙述者是同一个主体。按照布斯不可靠叙述概念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以及其他主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无法构成不可靠叙述。例如记者不参与故事,只在叙述外进行观察、记录,记者与叙述者合一。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新闻报道中的作者与叙述者是否同一个主体。笔者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虚构性叙述与事实性叙述的关系。

### (一)新闻报道作为事实性叙述成立吗?

对于如何判断虚构性叙述与事实性叙述,热奈特在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中是从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来考察的:对我而言,只要能确立两者之间严格相等的关系(A=N),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界定为事实性叙述。相反,作者与叙述者的背离(A≠N)则界定为虚构性叙述,作者不能严格保证其叙述的真实性。热奈特在这里所谈

到的虚构性叙述与事实性叙述并不涉及叙述的内容真实与否,关于二者之间的界限,热奈特认为其并非水火不容,相当多的虚构性叙述不过是采用了虚构化手段对事实性叙述的模仿,并且这些虚构化的叙述手段业已深入某些事实性叙述。对此热奈特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纯虚构的小说或者纯粹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或多或少都会留有谋划的痕迹或者采取小说的手法,虚构性叙述与事实性叙述并非遥不可及,也并非如它们显现的那样纯粹单一。

叙述学至今的研究成果可以运用到非虚构性叙述当中,即便不可靠叙述的提出者韦恩·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的修订版中也提到他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叙述手法可以被运用到诸如历史、神话、新闻报道等领域中去,甚至《小说修辞学》可以定名为《叙述的修辞》。里蒙·凯南也认为:事实上,在分析虚构作品时运用的一些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于传统规定为“非虚构类”的作品。<sup>[1]</sup>

由此可见,事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巴尔特就明确否认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的区别,海登·怀特甚至声明历史叙述等同于虚构叙述。众所周知的是,新闻报道作为一种选择事实的艺术,永远无法呈献给我们全部真相。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无论是新闻还是历史都难逃语言的介入,巴尔特认为,事实只能以作为一个话语项的语言方式而存在,无论何种话语都不可能达到真实界,它只不过是培植了一种真实性的效果,而所谓的“真实”来自叙述者精心的叙述、讲究的章法和细节的扩充<sup>[2]</sup>。

收稿日期 2012-03-07

作者简介 冯月季(1977 )男,河北保定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安顺学院讲师。

## (二)新闻报道中的叙述者

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新闻报道中的叙述者就是记者。但是从新闻文本的生成过程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由于记者本身的活动范围有限,大多数的新闻报道并非来自记者的直接观察,而是来自其他人的转述。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实际上记者无法面对新闻事件的底本,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个个经过转述的述本,依据新闻价值和新闻职业规范,记者要在这些述本当中进行选择取舍,进行述本再加工,再加工的述本依然不能完整呈现在媒体上,其间还要经过媒体编辑等一系列审核修改之后才能见诸媒体。

从一篇新闻报道经源文本到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就是写这篇新闻报道的记者,而叙述者则可能包含多个主体,其他叙述者或以显身叙述者的方式(如作为新闻报道中人物的叙述者)存在,或以隐身的叙述者的身份(媒体编辑等)存在。相当多的时候,新闻文本还要受到隐含作者的干预,它的功能异常强大,稍后将对其进行分析。

即使在我们想象中最接近自然化和真实的新闻图片依然存在作者与叙述者背离的情况,而且更容易理解。1994年6月27日,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公布了辛普森被捕的图片,题为《美国的悲剧》,但是《时代》杂志刊登的图片非记者拍摄的真实图片,而是通过技术处理加深了辛普森皮肤的颜色。这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此举也招致了全美报业摄影协会的指责,他们认为这幅图片具有种族歧视的含义。

通过这两幅新闻图片的命运就比较清晰地看出,它们的作者与叙述者并不是同一个主体,二者之间甚至存在某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并未在文本上表现出来)。这在文字、视频等新闻报道中同样存在,受众所面对的是一个由多个叙述主体进行干预的新闻文本。这样我们对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就有了一个基点,即可以从新闻文本着手。丹麦叙述学家汉森在这方面已有尝试,他认为对事实叙述的不可靠性研究应当从文本与语境知识两方面来架构。

### 二、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路径

尽管笔者在前面分析了事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的关系,但是在探讨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问题上仍然不能如实地照搬虚构性叙述研究的理论,与虚构叙述最大的不同是,新闻报道与日常生活世界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研究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路径。

#### (一)回溯不可靠叙述

按照布斯的解释,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时,我称之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他就是不可靠的。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叙述者对事实的报道或对价值的判断存在错误。为了辨别叙述者的这种不可靠,布斯引入了隐含作者这个概念。隐含作者是指以某种写作状态存在的作者的第二个自我。沿着布斯的脉络,西摩·查特曼与詹姆斯·费伦修订了布斯的理论。查特曼认为存在一种潜在的规则制约叙述者的叙述行为,隐含作者是这种规则的操控者,但是它有意保持了沉默,由隐含读者代为其行使对叙述者的叙述进行价值评判的功能,由此查特曼将不可靠叙述引向了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冲突上。费伦在两个方面发展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研究。其一是费伦将不可靠叙

述的范围扩大,他认为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sup>[2]</sup>。其二是开始在作者、文本、读者互动进程中考量不可靠叙述,从根本上说费伦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依然聚焦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

修辞性研究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遭遇了认知(建构)学派的挑战,特拉维夫叙述学派的代表人物塔玛·雅克比将读者角色引入不可靠叙述研究。雅克比将不可靠性看做是一种阅读假设,并认为随着阅读语境的转换,相异读者的阐释策略也有可能导向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转化。所以,文本的不一致性与不可靠性之间并没有自动的联系。

另一位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叙述学家A.纽宁,他也将不可靠叙述归因于读者的阐释策略,并针对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进行了批评,将不可靠叙述引向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范式上来。后来纽宁修正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认知修辞方法的综合研究。

#### (二)聚焦隐含作者

认知(建构)方法对修辞方法最大的批评来自隐含作者这个概念,A.纽宁认为,隐含作者的概念含混不清,前后充满悖谬,并且难以把握,因而反对用隐含作者来作为判别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标准。

对于虚构叙述中隐含作者的概念,米克·巴尔认为是由作品构筑并由读者感觉到的真实作者的形象。热奈特持有相似观点,他说:他显然不是有实效的主体:虚构叙事由叙述者虚构产生,实际上由(真实)作者产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工作。<sup>[3]</sup>

与此相对照的是,笔者认为在新闻报道中不存在这样的争论。新闻报道中的隐含作者清晰可见,它是一个复合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媒体的职业规范。(2)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阶层。(3)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

前面我们提到隐含作者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是,整个新闻文本产生的流程都离不开隐含作者对新闻文本的干预。与文学叙述相反的是,新闻报道中的隐含作者并不是由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在新闻文本产生之前它就已经端坐在那个位置上,审视并操控着记者的写作。如果说在文学叙述中是真实作者建构了隐含作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新闻报道中是隐含作者塑形了真实作者。

因而在新闻报道中,隐含作者乃是最核心的概念,新闻文本中各叙述主体都要受到它的掌控,它是准确理解新闻文本意义的最主要来源。从隐含作者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新闻文本中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如下的控制机制:

隐含作者 媒体编辑 记者 (作为叙述者的)人物

确立了隐含作者在新闻文本中的中心地位后,就可以理解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如何生成了: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离不开新闻文本意义的生成,意义的生成来自读者的阅读活动与文本的互动,未被读者阅读的文本只是作为等待理解的符号体系,被读者阅读的文本才是创造并生成意义的文本。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新闻报道中隐含作者与读者是产生文本意义互动的一对主体。另外从符号表意

过程来看,接受者是传播得以实现的根本要求,如果符号发送者的意图定点与某些读者的阐释发生冲突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靠叙述,这种不可靠性或来自文本内,或来自文本外,同时也会受到历史语境及其文化的影响。在此,笔者尝试将A.纽宁近年提出的认知修辞方法的综合应用到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研究中来。一个叙述者是否可靠,不仅依赖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价值规范的差异,还要看叙述者与读者或批评家之间世界观的差异。由于在新闻报道中隐含作者决定了叙述者的价值规范,因此对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研究路径就转移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来,并且在此笔者将布斯关于不可靠叙述定义转换如下:在新闻报道中,当隐含作者与读者的价值规范一致时,称之为可靠的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的叙述。

### 三、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分类

由于对认知修辞方法的借鉴,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研究便脱离了早期对不可靠叙述经典研究的范畴,从而成为一个综合多重文本与历史文化因素的现象,据此我们将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分为三种类型。

#### (一)文本内不可靠

不可靠性来自文本自身充满矛盾或构成反讽的方式,汉森称之为叙述内不可靠,它是由文本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的不可靠性。本文在这里所论述的与汉森并不相同,汉森所言的叙述内不可靠是指不可靠叙述的经典定义,即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规范的冲突,仍然属于虚构叙述的范畴。

不过汉森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事实性叙述的不可靠问题,他分析了纪录片《华氏9·11》导演迈克尔·门罗对事实的操控或加工,并认为这是一个个性化甚或是不可靠的叙述,这种不可靠性既来源于文本之内,也来源于语境事实和情境,批评家或读者能够据此对文本进行认知。就纪录片而言,它与新闻报道的区别在于新闻报道中隐含作者对叙述者价值规范的制约,不过在不可靠性问题上二者却有共通之处,例如2010年发生在贵阳的中华车女司机当街暴打女记者事件与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纪录片一样,在关于这则新闻的报道中同样存在着叙述者对事实的加工,从报道的内容而言,它并不构成虚假报道,只不过是某些事实排除在了报道的内容之外。这与费伦所论述的不可靠叙述六种类型之一的不充分报道具有相似性。按照费伦的理解,不充分报道——热奈特称之为“少叙法”——是指叙述者讲述的内容少于他所知道的东西<sup>[2]</sup>。在隐含作者的默许之下,叙述者对新闻报道内容进行删减,就构成了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由此导致了在另外两个轴上的错误解读以及错误评价。

文本内不可靠也来自布斯所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共谋感所造成的反讽效果。布斯认为:反讽永远是一种既包含又排除的手段,那些被包含进去,恰巧掌握了必要信息,能够理解反讽的人,他们的愉悦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一种感觉。这种反讽中,叙述者就是反讽的对象,作者与读者在叙述者背后达成了秘密的共谋。<sup>[4]</sup>在新闻报道中,也存在由这种共谋感造成反讽效果的文本,不过反讽的对象则偏向于隐含作者。例如在全国房价疯涨、民众怨声载道的时候推出“丈母娘推高房价”的新闻报道,在知情的读

者看来,这是极不可靠的叙述,叙述者试图转移读者的视线,但是却造成了极大的反讽效果。

#### (二)伴随文本不可靠

伴随文本是指不显现于文本本身之中,但是符号接受者很可能意识到,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其存在。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但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sup>[5]</sup>。新闻文本的释义要受到各种伴随文本的影响,面对同一个新闻事件底本,由于叙述者的报道视角相异会产生价值观点不同的新闻述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体会到不同的隐含作者支撑的新闻文本。对读者而言,这些伴随文本都具有参考价值,都揭示了事物的某一个方面,都能支持隐含作者的观点,具有相对固定的意义,但是将不同述本放在一起理解时就会产生意义冲突,因而造成了一种文本间的不可靠性。

#### (三)历史文化语境不可靠

另外,不可靠叙述与文化和历史语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读者在面对同一个文本时就会持有迥然相反的观点,文本意义就不能绝对地从文本内部产生。例如A.纽宁就曾以奥利佛·哥尔德斯密斯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说明了不可靠叙述不能脱离历史语境而存在。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普利姆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是此后被大多数批评家看做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从可靠到不可靠变化的原因在于文本意义的重构与读者价值体系的背离。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它同样受到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个新闻文本面对持有不同能力元语言的读者(同时更受到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影响)必然产生出多套意义。比如西方媒体对中国公共事件的报道,对西方社会的读者来说是可靠的叙述,放到中国语境下则是不可靠的。另外从历史语境来说,阐释史上很多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后来又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原因并不在于早期解读的错误性,而是因为后来的读者与早期的读者拥有不同的范式和价值观念<sup>[6]</sup>。比如过去我们很多对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观念备加推崇,在今天看来那则是不可靠的叙述,甚至荒诞不经。

#### 参考文献:

- [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2]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Second Ed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6]佩尔·克罗格·汉森.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J].尚必武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7):36-39.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 dalishi\_\_sohu@sohu.com)